



贵州民族大学
GUZHOU MINZU DA XUE XUE SHU WEN KU

德勒兹『重复』

美学思想研究

● 宋涛 著

自古希腊肇始的西方传统认识论，一开始就存在着抽象和具体孰重孰轻的分歧。其后演变为中世纪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执、现代以来本质论和反本质论的对立、后现代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鸿沟。“重复”作为哲学范畴，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柏拉图将客观世界视为对“理式”的反映和模仿，由此开启了建立在同一逻辑之上的重复这扇大门，确立了重复的概念性知识谱系；概念具有同一性，因此概念性重复必定忽略个体，抹杀差异性。相反，德勒兹石破天惊地指出，世上还存在无概念的“重复”，也即非同一律的重复，因此必然会重视个体和异质性，这种重复正是差异。



中央民族大学
China Minzu University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GUIZHOU MINZU DAXUE XUESHUYU ZHUZUO CHUBAN JIJIN ZIZHU

德勒兹『重复』

美学思想研究

● 宋涛 著



自古希腊肇始的西方传统认识论，一开始就存在着抽象和具体孰重孰轻的分歧。其后演变为中世纪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执、现代以来本质论和反本质论的对立、后现代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鸿沟。“重复”作为哲学范畴，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柏拉图将客观世界视为对“理式”的反映和模仿，由此开启了建立在同一逻辑之上的重复这扇大门，确立了重复的概念性知识谱系：概念具有同一性，因此概念性重复必定忽略个体，抹杀差异性。相反，德勒兹石破天惊地指出，世上还存在无概念的“重复”，也即非同一律的重复，因此必然会重视个体和异质性，这种重复正是差异。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DELEZIZHONGFUMEIXUESIXIANG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研究 / 宋涛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7. 7 (2017.8重印)

ISBN 978-7-5660-1394-1

I. ①德… II. ①宋… III. ①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美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6296 号

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研究

著 者 宋 涛

责任编辑 舒 松

责任校对 胡菁瑶

封面设计 符 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394-1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张学立 陶文亮

副主任委员：唐建荣 张鹏程 肖远平（常务） 胡忠良 王 林
韦 维 樊铁钢

委 员：白明政 陈玉平 蔡曙山 蔡小华 龚 锐 封贵平
胡启勇 胡 愈 黄 雯 黄 咏 刘吉昌 柳远超
龙海燕 龙 潜 龙耀宏 卢云辉 任达森 石开忠
宋 强 索洪敏 唐德松 汤洪敏 田景仁 童 红
肖唐金 颜春龙 杨昌儒 杨世如 杨吟野 叶成勇
喻野平 张 红 周相卿

办公室主任：任达森（兼）

摘 要

自古希腊肇始的西方传统认识论，一开始就存在着抽象和具体孰重孰轻的分歧。其后演变为中世纪实在论和唯名论的争执、现代以来本质论和反本质论的对立、后现代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鸿沟。“重复”作为哲学范畴，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柏拉图将客观世界视为对“理式”的反映和模仿，由此开启了建立在同一逻辑之上的“重复”这扇大门，确立了重复的概念性知识谱系；概念具有同一性，因此概念性“重复”必定忽略个体，抹杀差异性。相反，德勒兹石破天惊地指出，世上还存在无概念的“重复”，也即非同一律的重复，因此必然会重视个体和异质性，这种“重复”正是“差异”。

第一章 区分了同一性与差异性两种范式下的“重复”，同时揭示了德勒兹“重复”哲学概念的产生过程。由柏拉图肇始的表象哲学——同质复现奠定了西学同一律重复的主从关系模式；而克尔凯郭尔的重复性审美生存、尼采的永恒轮回和德勒兹的“重复”则颠覆了“重复”的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将始终受制于同一律的差异性重复解放出来；由此完成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审美范式转换。德勒兹的“重复”：无概念差异经由时间的三次综合而来，这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时间类型，在吸收和借鉴柏格森绵延时间概念的基础上，德勒兹用习惯、记忆和重复重写了主体的差异性生成过程。

第二章 德勒兹“重复”美学思想的核心：“差异为自身立法”的“哥白尼革命”。德勒兹“重复”美学是康德以来西方认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里程碑。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的三次综合提出批判，德勒兹完成了被其称为“差异为自身立法”的“哥

白尼革命”，彰显了后现代语境下的主体性美学要义：在差异的前提下思考同一性，即差异才是第一性的。但这同时也暴露出德勒兹“重复”美学的先验经验主义特征。

第三章 德勒兹“重复”美学的横向比较研究。

自亚里士多德始，作为西学形而上学核心命题之一的差异，就以实体性特征昭告于世人：种、属的客观实存与范畴有异，到了近代，黑格尔辩证法预设了同一律的优先性，将差异视为矛盾、否定，以及最终对统一性的臣服，德勒兹对黑格尔的批判一方面消解了绝对精神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完成了德勒兹“重复美学”的再主体化过程。同样身处后现代语境，德里达用延异和播撒的差异性概念解构了传统语音中心主义，尖锐指出声音与书写的断裂之处正是同一幻像的诞生地。不过，与德勒兹相反，德里达并未肯定差异具有积极性，这正是两者审视差异的重要分歧。

第四章 德勒兹论《白鲸》《变形记》：主体的多元性。

德勒兹虽然没有系统化的文学理论，不过，在对文艺作品的解读中，仍旧清晰可见其主体性美学思想脉络。德勒兹在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看到主体存在多重可能性，并用其独创的生成、逃逸线、解辖域化等概念建构了非一元论的主体性美学视野：主张生成为动物、生成为妇女的自我—他我转换。此外，德勒兹强调文学属于人民而不是文学史，驳斥追求普适性的“多数文学观”。

第五章 德勒兹论《追忆似水年华》：主体的文学表达。

如果说文学作品与哲理思想具有某种契合性的话，德勒兹无疑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看作应验其差异哲学的经典文学范例。德勒兹的重要哲学术语：时间、习惯、记忆，被逐一落实到主体意识活动的各个层面；由此，普鲁斯特对流逝岁月中回忆的无限怀念，实际上塑造了无意识主体的差异性。

第六章 以德勒兹“重复”美学为参照，考量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

从黑格尔到德勒兹，主体性作为人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全球化语境下被消弭成“无主体的主体”形式，德勒兹的“重复”美学在尼采的“上帝之死”、福柯的“大写的主体之死”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死”的废墟上重建主体性，这一重建首先表现为德勒兹对马克思社会批判学说

的批判性继承，肯定人的欲望、强调个体差异性、高扬生命的主体性；然而，过度强调主体的唯一性难免坠入虚无主义的泥沼。因此，兼容同一与差异的方法论对当代中国文艺研究出现的文艺学泛化、文艺学研究文化化、日常生活审美庸俗化具有启示作用。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内容	19
第三节 德勒兹“重复”美学研究现状	20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37
 第一章 “重复”系谱学与德勒兹“重复”旨意	39
第一节 “重复”思想史回溯	39
第二节 德勒兹的“重复”	64
 第二章 “重复”：德勒兹的主体性美学	99
第一节 “重复”的“哥白尼革命”：康德综合观批判	99
第二节 “重复”：德勒兹的主体性美学	115
第三节 对德勒兹“重复”美学的批判性思考	133
 第三章 德勒兹差异思想比较研究	153
第一节 无概念差异对抗范畴普适性：德勒兹与亚里士多德	157
第二节 “我他意识”与“主奴关系”：德勒兹与黑格尔	166
第三节 肯定与否定：德勒兹与德里达	184
 第四章 德勒兹论《白鲸》《变形记》——主体的多元性	201
第一节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	204

第二节 卡夫卡的《变形记》	216
第三节 德勒兹论“少数文学”	233
第五章 德勒兹论《追忆似水年华》：主体的文学表达	241
第一节 普鲁斯特与符号	244
第二节 文学的差异性表达：时间、习惯、记忆	258
第三节 文学的主体意识	277
第六章 德勒兹“重复”美学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无主体 的主体”	282
第一节 主体的转化	283
第二节 “重复”主体	298
第三节 “无主体的主体”	305
第四节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主体性问题研究	321
结 语	340
参考文献	343
附 录	367
致 谢	369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意义

一、同一与差异的西学背景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7—1997）在其著名的《刺猬与狐狸》一文中，引用希腊哲人阿基洛克斯（Archilochus，680—645BC）的残诗：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①，意指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比喻两种思维模式与哲学建构：狐狸的思维模式属于发散型，它的兴趣广泛，东张西望，走走看看，采取多种方式追逐、猎取目标，其思想方式具有多元化的倾向。狐狸更关注事物本身，对建立某种中心和体系缺乏兴趣，而刺猬型的思想者则目标宏伟，常常在一件事情上深思熟虑，并将各种要素纳入其中，试图建立完整的庞大体系，实现一以贯之的宏旨。刺猬感兴趣的“一”，具有两层含义：一种是理论上的，即首先确立一个中心，通过逻辑演绎，试图把各种范畴统摄在这个宏大、完整的中心内，并以此解说各种客观实在；另一种是实践上的，即为了维护中心论的合理性，试图在政治、伦理、社会学领域推行其理论，从而实现无所不包的同一性命题。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好比建立庞大体系的刺猬。如黑格尔为了追求其哲学体系的整齐划一和严密逻辑，将世界看作服

^①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3: 1.

务于绝对精神的实在，并强行将此纳入其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三段式理念中。相反，柏格森、德勒兹则是狐狸型的哲学家。柏格森认为，哲学并不是要建立体系，他声明：我没有体系，我没有普遍原则。对于柏格森来说，思想中的非传统性才是最主要的，显然，对于柏格森来说，正是体系成了哲学的原罪。^①

德勒兹哲学的思想形成深受柏格森影响，有学者认为，在西方哲学思想家中，柏格森是德勒兹真正的导师。在后现代思潮中，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思想成为后现代思想大家对启蒙以来确立的现代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有力武器，这种有别于构建庞大体系的思维方式视同一性，以及由同一性衍化而来的绝对性为制约哲学思想发展的桎梏。

启蒙运动的最初观念出现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英国，强调理性是通向知识的唯一途径，这种途径自科学革命以来就一直是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自然科学家追求的目标。启蒙理性具有以下思想内涵：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事物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理性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是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启蒙运动以牛顿的新方法论纲领为特征，即不应当从任意的、先验的出发点入手，不应当从某种假设入手，然后充分展开其中的逻辑结论，因为这样的假设能任意杜撰和修改。相反，必须使经验和观察作为真正的出发点。启蒙思想家所表现出的方法论正是建立在理性统一论的基础上的。他们相信科学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成功的科学方法（数学和实验的结合）和获得真理的保证（理性），这两者使人类可着手发现一种既简单又普遍的自然秩序。18世纪的两个主要概念——自然和理性，就像后来的进化论概念一样，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有力支持，并延续到人，使人和人的行为都处于自然秩序中，处于科学方法范围内。18世纪的伟大综合，始于牛顿自然体系所描绘的宇宙的理性秩序，科学的方法和理想被应用到宗教、应用到广泛的人性科学。这门人性科学包含了关于心灵、社会、商业、伦理学和国际关系等的理性的科学。^②

^① Alain de Lattre. *Bergson: Une Ontologie de la perplexité*. Paris: PUF, 1990: 19.

^② J. H. Randall.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nd*.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6: 255.

启蒙运动的理性其实是一种能力，是结合和分解的能力，是“分析精神”，它是“实证精神”和“推理精神”的综合。启蒙运动追求理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使“分析”成为一般思维工具。近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将自然现象的多样性还原为单一的普遍规律，启蒙时期的思想家相信这种分析精神不仅在自然界能获得成功，而且在人的精神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可获得同样的自信。18世纪的思想家都赞成分析不仅是获得数理知识的思想工具，而且可以成为所有思维必需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以理性的统一信念为基础，将分析方法运用到形而上学、人的心灵、道德、经济等领域，表现出一种方法论的科学主义倾向。启蒙运动中理性的统一有两个走向：一是用分析方法统一知识；二是知识的进步，即用科学的累积进步观看知识的发展。他们把历史设想为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桩事必然导致下一桩事。这是由自身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的。非理性是被统摄在理性中的。在理性统一论的指导下，启蒙运动的批判理性的矛头直接越过自然科学领域，直指宗教、法律、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威、传统和习俗。从17世纪到18世纪，启蒙理性凭借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向世人昭示了其难以撼动的可靠性，并对社会及人文科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19世纪至20世纪，科技理性以现代性为外衣，在民主进步的映衬下，将理性的普适价值辐射到整个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完成了其从自然科学始，至形而上学终的完整演替。

然而，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哲学、文学、艺术学领域内进行逻辑推理和演绎，无疑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使形而上学研究更加抽象化、虚无化，如康德之前的哲学成为世人讥讽嘲弄的对象；另一方面，科技理性使研究成果实体化，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被这种流水线似的知识生产范式纳入其中，进一步弱化了自身的学科特征，在普遍性和统一化面前彻底缴械投降。从文学到艺术，对人的关注渐受冷遇，遭到漠视，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取代个体间的差异性成为主流，寻求普遍真理，追求现象后的本质被确证为所有领域研究的必由之路，而结论总是倾向共性的，于是，差异性面临彻底消亡的危险，甚至在宏大叙述面前，怀疑自身的存在。

以德勒兹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牢牢控制

并主宰了哲学史话语权的思想的孳根性，以同一取代差异的宏大叙述的弊端及隐藏其后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从利奥塔对元叙述话语的颠覆，到德勒兹开创性地提出差异思想一说，后现代思潮批判现代性的犀利之处正在于其准确地捕捉到，由科技理性主导的权力、知识、语言、文本之后潜藏着以“一”胜“多”的不平等、压迫和强权。后现代思潮从整体上说，企图确立的正是差异性的合理性、个体的独立性，以及追求在“生成”中的话语权。

现代性以同一性逻辑为核心，以本质主义和等级递归为显著标志，透过现象探求本质，追求抽象概念的永恒性，试图以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取代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从而确立以大一统思想统摄物质与精神世界的永恒原则，当然同一性原则本身就是这一思维模式的预设前提。

透过现象探求本质，一方面反映出人类思想史上探本溯源的求知方式，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本性，是对人性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也说明哲学史的发展是由各种思想交替演绎、碰撞、争执、甚至斗争形成的，差异性思维在哲学史上不乏其人，就近代哲学而言，柏格森哲学思想成为与形而上学产生巨大分歧的精神典范，柏格森哲学以事实为参照依据，这意味着研究方法转向，研究重点由抽象的演绎回归到客观实在，关注当下，而不是构建虚无的幻像。

柏格森的直觉概念从人的立场出发，探讨主体对客观实在的体会和心理活动过程，对传统西学思想界产生巨大冲击。当代西方哲学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当“回到柏格森”一次次成为应对当下思想困境的出路时，由柏格森以及柏格森之后的德勒兹思想所持的批判态度所引发的深刻反思也再次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反中心、反本质、多层次性的思维方法，自后现代时期形成整体规模之后，成长为与现代形而上学对抗的思想潮流。

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整体到个别，哲学研究路向的转变不能不说是西学研究思维的重大转型与突破，从此，同一性哲学在后现代思想家猛烈进攻的炮火声中节节败退、不堪一击，曾经一度辉煌的统一性表象（Representation），由于先天的致命缺陷，难以摆脱最终被击得粉碎的悲惨命运。

二、同一与差异的局限性研究

福柯的同事，法兰西学院教授哈多（Pierre Hadot，1922—2010）认为，对于古代人来说，哲学并不意味着建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进行自我陶冶的生活选择，是人们为寻求实践智慧而不断总结生存实践经验的艺术。^①很明显，哲学首先是一种生存艺术，是智慧的总结，是由个体的体会或经验汇集而成，是由现实而来的。

与此相对，现代性内含的同一性命题在形而上学领域常以体系哲学的面目出现。然而，体系的形成，总是一个试图将各种要素纳入其中，以求体系完整和全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普遍性是体系首先感兴趣的，因为普遍性可以将体系的适用性推广到极致。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范畴，体系总是设法演绎出范畴，由范畴去完成这项工作，范畴的普遍意义使其在宏观上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没有什么可以逃离它的掌控，因为范畴是经过严密逻辑论证的理性。与之相反，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理性成为被范畴抛弃的孤儿，因为这些要素对体系的构建并无裨益，最多不过作为对体系的补充和说明出现，它们本身无关体系的旨趣。

通过分析可知，同一性排除了于自身并无实际意义的不确定要素，对于这些要素来说，由同一性衍生出的体系是先天闭合的而不是开放的，于是体系的致命缺陷就暴露无遗了，因为体系以外的合理要素试图进入体系时，会遭到强有力的抵抗，体系拒绝接纳它们。

黑格尔哲学作为现代性标杆，建构了一个试图能够解说万事万物的圆圈式体系，这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即先假设了让体系成立的前命题——同一性；此后让对立和矛盾成为同一性的阶段性演示；最后，对立和矛盾无一例外地走向合，也就是同一性。可见，在黑格尔哲学中，体系已经完成了其无所不包的主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黑格尔哲学视为解读客观实在的圭臬，并对其庞大体系和理性至上原则备加推崇，由此，一元论哲学被推演到无以复加的主体地位，整体性似乎成为所有思维活动的最佳归宿，并且无一例外。黑格尔强调的绝对精神首先是先验的决定论，

^①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并以此为据,通过辩证法的演绎,彻底摒弃了生命的非理性和人类具体经验的实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诉求、灵魂的不确定性等。

以德勒兹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家深感这种现代形而上学造成的思想垄断极大地限制了思维的创新,从而极力要摆脱此种约束和控制。以差异思想为突破口,德勒兹强调具体经验高于不变的抽象原则,坚信不存在先天的思想体系可以支配信仰或者客观实在;无论是体系还是非体系,都是在主客观上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事实上,对客体或本体的认识不仅是没有答案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一切真理和假设都必须不断经受检验,对真理的追求应当是批判性的,这种批判性被限制在不明确的和多元论的暗示范围内,这样,对真理的追求就成为相对的、可能出错的,而不是绝对的、确定的。显然,这种非体系论的思维视角意图提高体系之外要素的合理地位,这一思想主题也成为后现代思潮的整体特征:解构现存结构、戳穿信仰,这是“德勒兹”式的狐狸们对刺猬们——“黑格尔”们的批判和矫正;与善于防护的刺猬不同,狐狸的思维方式似乎更能获取猎物,因为它们善于捕捉。

然而,差异性哲学在确立自身的开放性和独立性时,又面临缺乏坚实稳固的世界观这一严重问题,当物质与精神成为两种思维范式之争的焦点,并且在反复言说之后歧义纷争、各说各话时——当然,这激发了所向披靡的勇气和创造性,面对永无止境的终极追问和存在的有限,差异哲学思想也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令人消沉的焦虑和事实上的茫然不知所措。此外,差异哲学也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悖论,虽然证明了在庞大体系妄图驾驭所有知识的企图是软弱无能的,但正是现代性的致命之处,成为差异哲学的诞生之地,那种摒弃任何形式的元叙事、思想的统一性、存在的综合性或者类似的远大抱负的做法,并不能证明自身的立场就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后现代思潮是以消解元结构为前提的,如果这种前提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幻想,那么后现代思潮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没有一种得到后现代思潮公认的、潜在的元话语的存在,后现代思潮此前所做的思想批判只能是凭空捏造,这表明,后现代思潮其实也是一种本体论,同样以某种元叙述为指导思想,在以这种元叙事为指导的一系列颠覆活动中,越来越清晰的是,按照它自己的主张,它对历史的相对性和一切真理、知

识受文化的——语言的影响的论断必须被看作另一种局部的和暂时性的观点，而绝不具有必然的、普遍的、超历史的价值。显然，后现代主义的绝对性就是批判意识，这种意识因其自身的逻辑困境，被迫作这样的解构。这是遍布后现代思潮的普遍现象。

三、德勒兹“重复”美学的当代意义

在论述了同一性与差异性哲学之争后，德勒兹的差异思想对现代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本质就十分明确了，当然，仅就古典与近代、现代与当代的范式争论而言，差异、差异化思维无疑具有积极进步意义，至少，它打开了当代思想研究的另一扇大门，即使这扇大门实际上仍旧可能是整体意义上的局部和个别。

格特鲁德·斯泰因提到，在 20 世纪，没有与别的事物相一致的事物。后现代思潮在很多领域里，主张认知的多元化，以此克服过去的整体划一的稳定性，这解开了长期以来困扰现代思想和现代精神的精神枷锁。后现代提倡多元、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没有统一观点，没有一致确认的思想模式的时代，正是这种由明显差异组合而成的多元化，使得后现代思潮中各种异彩纷呈的观点，适用于解决大量当下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面临的难题。但是，尽管后现代思想家们消解同一性的目的是一致的，从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到利奥塔莫不如此，但他们各自的概念又是分离的，各种差异化的概念之间也存在互相消解的作用，这样，后现代主张多元论的核心显然受到了削弱，其后果必然是，后现代思潮在面对攻击和质疑时，由于缺乏稳定的结构和基石，其说服力不具有普遍性和征服力，影响力受到了损害，这种凝聚力的缺失形成了后现代思潮虽然一方面在极力鼓吹差异，另一方面则是显而易见的，被动面对差异化之后的空洞和虚无。人们开始怀念那种全面的、稳定的、能够不断满足迅速增长的多样性所需要的统一答案，即使这种答案有时是那早已被批判过的、有明显缺陷的体系和结构在死灰复燃之后的再次兴妖作怪。

令后现代思想家们尴尬的是，差异的积极意义也常常被这种过度追求与众不同的混乱所消解，差异同样能够造成混乱，差异一旦陷入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将会成为抑制自身的直接后果。这导致后现代提倡的差

异——多元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形而上学。这也是后现代思潮一直为人诟病的深刻原因。当然，后现代思潮赋予了思维鲜活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创造空间，由于没有大一统的文化范式常有的积淀和模式的阻碍，能够超越常常禁锢和阻碍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系列困扰。但是，当思想因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哲学的失范而在精神上和实际上受到损害，由于缺乏任何切实可行的、令人信奉的思想学说，旧的假设又成了人们思想活动的指南。

这样，寻求两种思维之间或之外的更加灵活、适用的思维方式就成为绝对和必然。否定绝对化，肯定人对实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渴求，而不是对此进行压抑和扭曲，对于种种争执和偏见起到调节、综合和澄清的作用，成为当下理论建构之所需。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思想已经对此作了乐观的暗示，或者，这代表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一种新的方法论？其原则和理想颇具启发性。

历经后现代思潮洗礼，当代美学面临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差异性与同一性并置的“共存论”，而是要什么样的“共存论”。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取向是以普适性为内核的话，那么，如何重建包容广泛差异性的普适价值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进一步的问题是：第一，是否存在这样的普适性？第二，如果有，那么如何建构？第三，这是否导致另一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在这方面，后现代范式中也有一些可借鉴的资源。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多半是在其内部看待自身，而后现代则是从外部来考量，提供了一些从自身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现代性与后现代形成了一个互补性的视域融合。他者观念的出现，要求在普适价值建构过程中，尽力注意到他者的存在及其表征。后现代关于他者的研究，也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要求，那就是普适性的建构必须把他者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因素加以考量。只有我们以这样的参照来重建普适价值，它才具有真正的代表性和包容性。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现代与后现代的困局，为美学及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找到一条新的路径。

（一）从同一性逻辑到差异性逻辑的范式转换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西方美学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四次理论范式的转换，从古代美学试图建立美的统一标准开始，至近代文艺复